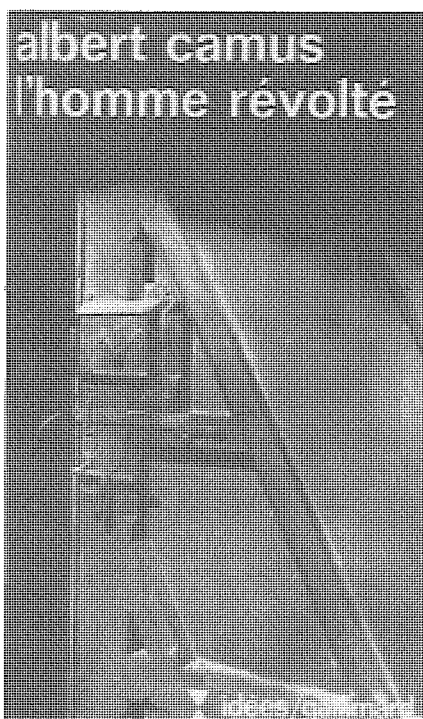


# 重提加繆與薩特之爭

• 郭宏安



Albert Camus: *L'Homme révolté*  
(Paris: Gallimard, 1965).

## 世紀末的疑問

暮色漸濃，檢點本世紀的輝煌與暗淡、光榮與恥辱，篤信進步與革命的人們多半會嘆口氣：「咳，又虧了！」近百年來，人類的良知經受了巨大的考驗，戰爭與和平、民主與專制、革命與發展，相繼成為歷史運動的主旋律，又都以不同的變調和強度貫穿始終，在希望與挫折的交織中構成了一個問題叢生、動盪不安的世紀。人類將帶着多少財富和多少債務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是每一個在世紀末思考人類命運的人不能不懷有的疑問。

人並非只是到了世紀末才有一種衝動，彷彿結賬的時候到了，感到有瞻前顧後重整旗鼓的必要。早在四十多年前，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已經算過一筆

賬，而其結果不免令人擔憂甚或喪氣。這個世紀五十年間流放、奴役或者殺害了七千萬人，如何評斷它？如何理解它？目的合理性能否保證手段的合理性？美好的未來能否要求犧牲幾代人目前的生活？人類處境的改善能否以社會的進步為至上的標誌？社會的進步能否以經濟和科技的發展為唯一的動力？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是否必然地給人帶來幸福？二十世紀的確是一個問題的世紀，是一個懷疑的世紀，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世紀。對此，加繆在他的長篇哲學隨筆《反抗的人》(L'Homme révolté)中，提供了「某些歷史參照和一種讀解的假設」，儘管「這種假設並非唯一的可能，亦遠遠不能闡明一切，然而它可以部分的解釋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向，幾乎可以完全地解釋其失度 (la démesure)」①。四十多年過去了，歷史的經驗表明，加繆的謙遜並沒有減弱他的「讀解」的力量。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凡是不斷地修正前進的方向，不斷地警惕和減少其失度，就會有希望的曙光閃現。今天，在一片世紀末的暮色的籠罩下，面對人類新的生存環境及其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新格局，本來就聚訟紛紜的《反抗的人》一書更閃爍着一種異樣的光彩，從書裏到書外都洋溢着奇特的衝擊力，使任何閱讀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

### 加繆激起爭端

吾生也晚，實難想像當初《反抗的人》這本書激起的普遍譴責和

有限讚揚包含着怎樣激烈的情緒，尤其在法國這個知識界傳統上左傾的國家裏，這本矛頭直指馬克思主義蘇聯化即斯大林主義的書，簡直形同叛逆，似乎人人可以口誅筆伐，直至「革出教門」。來自法國共產黨的責難最為尖刻，從嘲諷到漫罵到宣判無所不用其極。《人道報》稱這本書表現出「自命不凡的無知」，「思想貧乏得可悲」，所用材料乃是社會民主黨的「箱子底兒」。有論者把加繆看作壓迫者，「絕望地試圖保住已被人民的行動打得粉碎的壓迫的石板」。還有人指責加繆參加了討伐馬克思主義的「十字軍遠征」，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一起發出了「反蘇反共的恐怖主義的號召」。總之，「加繆為了在世界上保住『人道』，實際上想讓工人階級永遠受剝削，受侮辱，受痛苦」②。法國共產黨人的責難自有其意識形態的理由，不必求助於事實的支持。

來自資產階級左派知識分子的批評尖刻亦不讓法共，只是又多了一重居心的險惡。如果說弗朗西·讓松(Francis Jeanson)的批評斷章取義，徒具捍衛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的恐怖手段的政治激情，從而歪曲了加繆的思想，那麼作為讓松老師、加繆朋友的薩特的批評，則是一篇極盡諷刺挖苦訓斥教誨之能事的傑作，包藏着視對方的論旨根本不值一駁或者論敵根本不具備智力和學力的資格這樣一種自視甚雄的傲慢。加繆的論點固然不乏可議之處，但是薩特的批評往往在情緒的驅使下進入歧途，例如，他因為指責加繆用「沒有鬧的自由」這樣的

在一片世紀末的暮色的籠罩下，面對人類新的生存環境及其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新格局，本來就聚訟紛紜的《反抗的人》一書更閃爍着一種異樣的光彩，使任何閱讀的人都不能無動於衷。

用語批評存在主義的「自由」概念，便在「開」這個字上大做文章，甚麼自由「沒有輪子」呀、「沒有爪子，沒有領可放嚼子」呀，等等，於是「自由是不能被限制的」<sup>③</sup>，哪裏有放開的地方？說得滑稽可笑令人嘔飯，其實查遍加繆的文章也找不到「沒有開的自由」這種說法的影子。不過這沒有關係，奚落論敵並將他的臉抹黑的目的總是達到了。這個小小的例子說明，人們對明辨是非、嚴肅地討論問題並不感興趣，最重要的乃是明確意識形態的分野，劃清擁共和反共、親蘇和反

二十世紀快要走到盡頭，而她遺落的有多少殺戮、絕望與疑懼的記憶？



蘇、左派和右派的界限，並對逆我者發洩革命的義憤，儘管薩特及其朋友們還只是法國共產黨的同路人。

《反抗的人》激起的爭論當然不是知識分子之間的文字遊戲，掩蓋在激烈情緒之下的乃是人類良知面對當代重大問題時的恐懼和惶惑以及思考和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取得了反法西斯鬥爭勝利的人們驚愕地發現，等待他們的並非一個正義、自由、民主與和平的新時代，而是美蘇兩大集團的對峙和「冷戰」。對於法國知識分子來說，美國是個唯利是圖的拜金主義國家，擁有原子彈和稱霸世界的野心，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最大的威脅；而蘇聯則是反法西斯戰爭的頭號功臣，在國內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宣稱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人，為全人類展示出一個無比美好的遠景。因此，一向以伸張社會正義、維護百姓利益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傾向於蘇聯、傾向於共產黨、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似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一枚硬幣偏偏有另一面，遠自戰前就開始不斷有消息傳來，說那邊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戰後更有證據表明，那邊居然也有駭人聽聞的集中營，且關押的人數聽起來也令人咋舌。這不能不讓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性質，其運作手段和指導思想以及無產階級的真實地位等發生疑問，也不能不在左翼知識分子中間引起波動、混亂並造成分裂。

於是，無條件支持蘇聯的法共知識分子或者根本否認集中營的存在，或者把一切有關消息統統稱為

反動派的污蔑，或者竟把集中營稱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功績」。法共的同路人則認為那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手段，美其名曰「革命的暴力」或者「進步的恐怖主義」，而「為了不使法國的工人失望」，「在基層活動分子中造成混亂」，就有意地迴避一切對蘇聯不利的消息。還有為數不多的人認為集中營就是集中營，無論納粹的還是蘇聯的，並沒有甚麼區別，都應該加以揭露和反對，並把矛頭指向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及其指導思想斯大林主義。這第三種人既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反對蘇聯的社會主義，試圖形成第三種力量，走第三條道路，即「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第三種力量」的口號是「武裝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於美蘇兩大集團的「中立的歐洲」，以便「拯救和平，建立社會正義，維護自由」。然而，國外朝鮮戰爭的爆發，國內立法選舉的失利，很快在「第三種力量」中造成了分裂。原來宣揚「進步恐怖主義」的梅洛—彭迪(Maurice Merleau-Ponty)慨嘆「大炮響了，我們只好閉嘴」，從而脫離了政治活動。薩特則發表了〈共產黨人與和平〉一文，以成為法共的同路人而自豪，也就對蘇聯的集中營諱莫如深了，這表明他終於「選擇」了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當然也有一部分人轉而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而倒向了美國，加入了右派的行列。只有加繆特立獨行，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勇氣堅持第三條道路，也正是「第三種力量」的解體和內部的矛盾促使加繆完成了多年以來對「反抗和革命」這一問

題的思考，終於寫出並發表了《反抗的人》，時在1951年10月。

## 個體的生與死

加繆繼承了笛卡兒的傳統，他的哲學是一種生活哲學和道德哲學，他在任何時候的任何思考都有一個原初的、唯一的出發點，即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命和死亡。早在〈西緒福斯神話〉(“le Mythe de Sisyphe”，1942年)一文中，加繆就尖銳地指出：「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判斷人生值得生存與否，就是回答哲學的基本問題。」④於是死亡成為判斷人生價值的首要前提，自殺或者殺人成為否定人生的最深刻的理由。人發現了荒誕，就發現了世界，並從此與之共生共存，而自殺或者殺人同時也就取消了世界，所以人既不能自殺，也不能殺人，否則就意味着虛無主義統治了世界。然而加繆「感興趣的不是荒誕的發現，而是其後果」⑤，荒誕只不過是一個「已知數」，加繆從中推論出的後果卻是反抗、自由和激情。也就是說，意識到荒誕的人從此有了一條行為準則：義無反顧地生活，窮盡現有的一切，知道自己的局限而不為永恆徒費心力。因此，發現了荒誕，只能說明人的清醒，只有進行反抗，才能說明人真正地進入了生活。

人類的歷史和現狀表明，反抗就存在於荒誕的發現之中，從荒誕到反抗，乃是從個人進入集體，從哲學進入歷史，即從抽象的思辨進

加繆繼承了笛卡兒的傳統，他的哲學是一種生活哲學和道德哲學，他在任何時候的任何思考都有一個原初的、唯一的出發點，即作為個體的人的生命和死亡。

加繆在試圖使革命回到反抗的源泉時，引進了一縷古希臘的陽光，即崇尚相對、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陽思想。

入具體的行動。荒誕和反抗同為不可置疑的「我思」(Cogito)，所以加繆才能說：「我反抗，故我們在。」<sup>⑥</sup>也才能說：「在荒誕的經驗中，痛苦是個人的。從反抗的行動開始，痛苦才意識到它變成了集體的，成了所有人的遭遇。因此，一個感覺到了陌生性的人的第一個進步，乃是認識到他和所有的人分享這種陌生性，認識到實存的人從總體上都對這種相對於自身和世界的距離感到痛苦。一個人感到的病痛成了集體的瘟疫。」<sup>⑦</sup>這意味着，思考始於自殺和荒誕，還必須面對着殺人和反抗繼續進行，其結果是：荒誕排除了自殺的理由，也排除了殺人的理由，因此，反抗作為對荒誕的超越，並不是沒有限制的。這其中包含着一個深刻的疑問：「人是唯一拒絕其現狀的生物。問題在於知道，如果反抗是在使普遍的殺戮合法化之中完成的話，這種拒絕能否將其引向毀滅其他生物及自身，或者相反，如果不以一種不可能的無辜為念，反抗能否發現一種合理的罪孽的原則。」<sup>⑧</sup>因此，反抗只存在於主人和奴隸、即統治和奴役的關係之中，發生於主人對奴隸的驅趕和壓迫之時，故只有奴隸的反抗，沒有主人的反抗，反抗也只是「轉身」而已。反抗「否認無限的權力」，反抗的人「要求承認有人的地方就是自由的界限，而界限正是此人反抗的權利」<sup>⑨</sup>。所以，反抗不是無限制的，也不僅僅是否定和破壞：「何謂反抗的人？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如果他拒絕，他卻並不放棄，因此他從第一個動作始，又是一個說是的人。」<sup>⑩</sup>這就是說，並

非任何價值都與反抗相關，但是，任何反抗的行動都必然指向一種價值。

加繆是在形而上和歷史兩個層面上界定反抗的：「形而上的反抗是人起而反抗他的狀況和整個創造的一種運動。這種反抗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為他對人及創造的目的提出異議。」<sup>⑪</sup>形而上的反抗必然地針對上帝，走向人的神化，人從此進入歷史，並在歷史價值絕對化的神話中成為歷史的工具。反抗一旦脫離了原初的動力，走上意識形態至上、國家理由至上、歷史規律至上的道路，就必然地發生蛻變和墮落，其典型的形式就是二十世紀的革命，其普遍的內容就是殺戮的體制化與合法化。從反抗到革命，從形而上到歷史，從呼籲正義到頌揚暴力，從反抗的普羅米修斯到專制的凱撒：二十世紀從心靈到面目都使人感到惶惑和震驚，《反抗的人》正是加繆對此提出的一份沉痛而嚴峻的總結。然而，這份總結並非全然的灰色，加繆在試圖使革命回到反抗的源泉時，引進了一縷古希臘的陽光，即「關於界限的思想」，崇尚相對、平衡、自然和人性的地中海思想或者太陽思想。加繆說：「反抗只追求相對，只能許諾一種源於相對正義的可靠尊嚴。它主張一種界限，在此界限上人類建立了一致性。反抗的世界是一個相對的世界。」<sup>⑫</sup>因此，反抗在形而上和歷史之間為人類開闢了一條困難的道路，必然性為可能性所取代，矛盾既要被超越，也常常要相互依存。「歷史絕對主義儘管節節勝利，卻總是不斷地碰上人性的頑強的要



加繆以荒誕、反抗為其哲學思考的始點，實緣於身處的獨特歷史情境。

求，而人性的奧秘是由地中海掌握的，在那裏，智力是明亮的陽光的姐妹。」<sup>⑬</sup>這種崇尚均衡和適度的希臘精神雖然已被長久地忽視，但是令人欣慰的是，「在歐洲之夜的深處，太陽思想，這種具有兩副面孔的文明正等待它的黎明，不過它已然照亮了真正的控制的道路」<sup>⑭</sup>。

總之，加繆在《反抗的人》一書中描述了「歐洲之傲慢的歷史」<sup>⑮</sup>，他曾經並繼續迫使歐洲人思考和爭論，而從中獲益的顯然不僅僅是歐洲人。

## 知識分子的風骨

《反抗的人》引發了當代法國知識界最重大、影響最深遠的爭論，不過觸動了論戰者靈魂的並非因加繆的思想多麼高超和深刻，而恰恰是其清醒和明智及其表達的勇氣。加繆在《反抗的人》一書中表達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數端：歷史沒有

至上的目的或意義；革命是反抗的蛻變和墜落，因而不可能實現人類建立地上天堂的願望；二十世紀的革命因為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而必然導致建立新的專制；正義的世界需要價值，需要以均衡和適度作為保證，等等。放在人類思想史上看，這些思想未見新鮮，頂多只能是合乎情理而已。然而在冷戰的50年代初說出來，需要的不是多麼深厚的哲學修養，不可缺少的倒是誠實和勇敢。例如，人頭不是韭菜，這個道理很多人都知道，然而說出來就不那麼容易了，做起來可能就更難。加繆畢竟只是個知識分子，他不能做而只能說，他說了，而且是大聲地說了，也許他的說就是做。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經歷過抵抗運動洗禮的加繆也曾經發出過「從抵抗走向革命」的號召。然而當他獲知蘇聯存在着大規模的集中營的時候，當他看到「無產者戰鬥了，犧牲了，卻把權力交

《反抗的人》表達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數端：歷史沒有至上的目的或意義；革命是反抗的蛻變和墜落，因而不可能實現人類建立地上天堂的願望；二十世紀的革命因為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發而必然導致建立新的專制；正義的世界需要價值，需要以均衡和適度作為保證，等等。

給了軍人或知識分子(未來的軍人)，轉而受他們的奴役<sup>⑬</sup>的時候，他陷入了沉思，融匯個人的經驗和歷史的考察，提出了「反抗與革命」的辯證法，以最明確的語言說出了他對蘇聯社會主義、斯大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是貓就叫它貓」，這有時候竟會變成一件很困難並且需要勇氣的事情。例如，加繆稱作「終身流放」、「集中營制度」、「苦役犯監獄」之類的東西，許多人卻說成「反常」、「畸形」、「病態」、「贅疣」、「附加症狀」、「極端的革命紀律」、「權力的粗暴運用」、「再教育機構」、「歷史的必要性」等等，就是不肯說出那一個「貓」字。使用甚麼樣的詞語說話，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這一點，自幼就與文字打交道的薩特知道得最清楚，他就說過：「作家的職能就是把貓叫做貓。」<sup>⑭</sup>還說過：「我們作家的第一條責任就是恢復語言的尊嚴。……我們的思想並不比我們的語言更有價值，人們判斷我們的思想是根據我們如何使用語言的。」<sup>⑮</sup>只是薩特並沒有說到做到，他自食其言，在意識形態的誘惑面前退卻了。對於《反抗的人》引起的爭論來說，將近半個世紀的事實已經判定薩特輸了，雖然還有人賭氣地說：「寧可跟着薩特錯，也不跟着加繆對。」不過這種無可奈何的堅定，充其量也只能博人一粲而已。

## 與薩特割席

一種思想的價值並不完全在於

它的正確，也許更在於它能提供一種參照，提供一種發人深省的動力，提供一次對某種思維定勢產生疑問的機會。《反抗的人》在問世之初，同時受到共產主義、存在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基督教的抨擊，來自右翼資產階級的讚揚也摻雜着某種幸災樂禍的得意，確實是一本讓整個社會、尤其是左派知識分子不得安寧的書。加繆的思想超越於左右兩種思想的對立，唯以揭露當代的虛無、極端和失度為務，自然會四面樹敵，觸怒所有的人。然而這正是加繆的思想的價值所在，也正是加繆的精神的偉大所在。

在法國，自伏爾泰以來，讀者有待於作家的，就不僅僅是消遣，而是良心的指導。尤其自從德萊福斯事件以來，左拉的「我控訴」一聲怒吼，在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播下了「介入」的種子，並從此成為一種傳統，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廣闊的潮流。然而無論左的介入還是右的介入，知識分子在介入的時候其實都有兩種態度：即為了歷史還是為了人而介入，為了抽象的觀念還是為了具體的生活而介入。以二戰前後的那一代法國知識分子而論，薩特可為第一種態度的代表，加繆可為第二種態度的代表，或者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薩特是知識分子左派的代表，加繆是知識分子右派的代表。其實，左派和右派的稱謂起源自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鬥爭，至今仍是法國現實政治生活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不過已經很難再把它們與革命和進步或者保守和反動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一起了。加繆在

薩特說過：「作家的職能就是把貓叫做貓。」只是薩特並沒有說到做到。對於《反抗的人》引起的爭論來說，事實已經判定薩特輸了，還有人賭氣地說：「寧可跟着薩特錯，也不跟着加繆對。」

那封著名的〈給《現代》雜誌主編先生的信〉中說：「人們不能根據一種思想是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來確定其正確與否，左派和右派都不能決定一種思想是否真理。……總之，如果我覺得真理在右邊，那我就站在右邊。」<sup>①</sup>此種勇氣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因此，「左」「右」這樣的字眼用在加繆和薩特的身上似乎已經失去了意義，倒是他們之間的爭論向知識分子的良知提出的詰問會成為一個長久的話題。

薩特在回答加繆的信中說：「你可能貧窮過，但你已不窮了，你是個資產者，和讓松一樣，和我一樣。」<sup>②</sup>這句話說得過於輕鬆了。加繆和薩特不一樣，就以貧富論，薩特終其生不知錢為何物，因為他極少有缺錢的時候，而加繆直到獲得了諾貝爾獎才最終擺脫了貧困。與錢有關的還有他們的極不相同的童年，薩特是在一個語言學者的祖父的關懷下長大的，包圍着他的是書籍，餵養着他的是詞語，誘惑着他的是寫作；而加繆是在一個兇暴的外婆的棍子下長大的，他面對的是一個不知道如何疼愛他的寡言的母親，連一張寫字的桌子都沒有，有的只是不用花錢買的陽光和大海。薩特可以進巴黎高師，可以去德國研究現象學，可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問政治；而加繆只能半工半讀地唸阿爾及爾大學，早早地投身於反對社會不公的鬥爭，並且參加過法國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只是個初出茅廬的新手，但已經有了政治上的興趣；而加繆卻是《戰鬥報》的領導人，多少有資格對薩特的抗德功勞報以一笑。薩

特一輩子都在巴黎的左派知識分子中間活動，他自然可以「斷定資產者都是壞蛋」，但是這並不說明他對無產者有甚麼了解；而加繆卻始終和巴黎知識界格格不入，畢生跟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及巴黎的印刷工人保持着友誼。薩特的哲學源於思辯，而加繆的哲學則來自生活。因此，薩特可以論證「存在先於本質」、「原始謀劃」、「自由選擇」和「人命定是自由的」等等，結果是否定人性的存在，排除選擇的價值判斷，完全的責任變成了完全的無責任；而加繆則只是描述荒誕和探討如何走出荒誕，描述反抗和探討如何避免反抗的失度，結果是要人們「義無反顧地生活」，堅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這種種的差別足以讓薩特有意無意地小看加繆，因為他認為他們「在知識領域不能談得很深」，還因為他覺得加繆實際上「有一面是阿爾及爾的小流氓，很無賴，很逗樂」<sup>③</sup>。

薩特在給加繆的信中又說：「使我們接近的事情多，使我們分離的事情少。但是，這少仍嫌太多：友誼也是，有趨向專制的傾向；要麼完全一致，要麼反目成仇，而無黨派者如想像中的黨派鬥士那樣行事。」<sup>④</sup>這句話也說得過於輕鬆了。的確，有很多事情使他們接近，例如抵抗運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對美國的霸權主義的抵制，對自由和正義的維護，對蘇聯集中營的反對，等等。然而，「黨派鬥士」的行動最終使這一切都化為烏有。這裏扮演了「黨派鬥士」角色的不是加繆，是薩特，而薩特

加繆是在一個兇暴的外婆的棍子下長大的，他面對的是一個不知道如何疼愛他的寡言的母親，連一張寫字的桌子都沒有，有的只是不用花錢買的陽光和大海。





在加繆與薩特的整個論爭過程中，後者充分表現了布爾喬亞知識分子的傲慢。

所以如一個並非想像中的黨派鬥士「那樣行事」，當然不是出於甚麼鬥爭策略的考慮。戰後薩特選擇的是一種「源於抵抗運動的某種道德主義」和「實踐的現實主義」之間的「中介立場」，所以他的同情是在《髒手》(les Mains Sales, 1948年)中的賀德爾一邊，「完全地投身於他的目標」，即為了正義可以不擇手段。於是蘇聯方面的種種不義便可以不提了；而加繆則在所謂「正義和自由不能兼得」的時候，選擇了「自由」。因為「如果正義不曾實現，還有自由可以使人提出抗議，拯救人際的交流」，這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他認為儘管「資產階級的自由」本身毫無價值可言，但是它因提供了一種爭取正義的可能性而具有了一種外在的價值，因此不義無論來自哪一方面都必須加以揭露和譴責。

薩特的人是一個沒有過去也沒有現在的人，他被投向這個世界，他只受到未來的吸引，因此他只能選擇成為歷史的工具；而加繆的人是西緒福斯式的人，是普羅米修斯式的人，他「感覺到他的生活、他的反抗、他的自由，而且要盡其可能」。薩特是冷眼地觀察，對人和他的世界都是悲觀的，加繆是熱烈地擁抱，對人從不悲觀，悲觀的只是人的世界。所以他們一個說：「人首先是他主觀上感受到的那個謀劃」，而「他人是地獄」；另一個則說：「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我的王國在這世界上」。哲學觀的分歧造成了歷史觀和政治觀的分歧，薩特想要創造歷史，一切為政治服務，而加繆想要創造生活，拒絕使人成為歷史的工具。

薩特和加繆圍繞着《反抗的人》

的爭論曾經被一些人看做是「文人之爭」，也曾經有一些人在所謂「絕交」的問題上大做文章，更有一些人以哲學上的準備不足為由（薩特就說加繆沒有讀過黑格爾，沒有讀懂《存在與虛無》）而輕易地判定薩特是贏家。的確，加繆的哲學不那麼高深，論述不那麼精微，邏輯上也有些混亂，使用的材料也失之龐雜，結論自然也是良莠互見。但是如果僅僅以這些為理由來評判這次論爭，倒往往會真地暴露出論者的「內部困難」，而薩特恰恰是以此來指責加繆的。其實，加繆從未自詡為哲學家，也從未對玄妙的哲學術語表示過異乎尋常的尊敬，他永遠是使用普通人的語言，帶着智者的眼力、詩人的激情、鬥士的勇氣和騎士的執着，對普通人說普通的道理。這並不容易，這甚至在二十世紀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許多人知難而退，用高度技術性的術語來掩蓋他們的「內部困難」。所謂內部困難不是別的，乃是某些知識分子的膽怯和虛偽。他們或為盲目的熱情驅使，或故做革命的姿態，或害怕錯過歷史的列車，於是就有意無意地或者閉目塞聽，或者噤若寒蟬，或者避重就輕，總之是不願說真話，不敢說真話，直至不能說真話，違心之論倒成了家常便飯了。加繆和他為數不多的朋友們稱《反抗的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作為一種思想發展的總結，這個評價並不過分，然而對於這本書所面對的世界來說，它的重要性也許更多地是在書外。試問，對於其他地位日益下降的當代知識分子來說，還有甚麼比明智和真誠更重要的

呢？然則何謂知識分子？加繆說是「敢於抵制一時風氣的人」<sup>②③</sup>。作為知識分子，加繆似乎比薩特更純粹些，這也許是《反抗的人》能夠給予今天的讀者之最大的衝擊和啟示吧。

### 註釋

①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反抗的人》，七星叢書（伽利瑪出版社，1965），頁420；432；432；420；688；423；435；693；702-03；703；420；622；754。

② 參見《加繆與政治》（拉馬唐出版社，1985），頁10。

③②② 《答加繆書》，《處境》（伽利瑪出版社，1964），第四集，頁108；93；90。

④⑤《西緒福斯神話》，七星叢書（伽利瑪出版社，1965），頁99；109。

⑦⑧《甚麼是文學》，《處境》（伽利瑪出版社，1948），第二集，頁341；342。

② 《七十歲自畫像》，《處境》（伽利瑪出版社，1976），第十集，頁196。

③ 見讓·達尼埃爾：〈抵制一時風氣的加繆〉，法國《新觀察家》週刊（1987年4月19日），頁108。

試問，對於其他地位日益下降的當代知識分子來說，還有甚麼比明智和真誠更重要的呢？然則何謂知識分子？加繆說，是「敢於抵制一時風氣的人」。

郭宏安 1943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著有論文集《重建閱讀空間》，專著《論〈惡之花〉》，譯有《波德萊爾美學論文選》、《加繆中短篇小說集》、《紅與黑》。